

沦陷前后张庭济与“奉命维持”的 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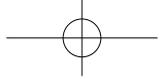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黄 金

内容提要 1933年之后，故宫博物院的工作重心和领导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文物的南迁和西迁方面，对于故宫北平本院的工作则不够重视、财务人力上支持也不够多。又逢日寇肆虐，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张庭济仍愿意来故宫工作，足见其勇气和用心。实际上，当时留守北平故宫的文物仍有许多精品，所以在日本侵略者觊觎故宫的形势下，留守文物与故宫古建筑的安全就面临着极大考验。所幸，在故宫总务处长张庭济的带领下和故宫留守人员的努力保护下，故宫虽然经历了日伪宪兵毁书夺杂志运动、献铜献铁运动、院长之位争夺等数次风波，但并未遭受到巨大损失，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关门死守，而是灵活地利用社会上的人力财力维持其运转，同时呼吁名门望族、前辈学者等协助保护故宫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能在艰难的沦陷时期仍然能够组织测绘、陈列开放、工程维修、图书编辑出版、文物点查与保管等工作，实属不易，意义重大。

关键词 沦陷时期 张庭济 维持 北平 故宫博物院 事业

绪 论

探讨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发展历史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从1933年开始，随着故宫精品文物的南迁，故宫主要领导和整个博物院事业的重心都随着这些文物的迁徙而转移，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些文物为避日寇从上海和南京库房开始西迁，之后故宫博物院事业的重心则一直寄放在西迁的线路上，而已然沦陷的故宫北平本院则相对被忽视。其实，对于民国时期故宫院史中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呈现出了相似的面貌，即研究故宫院史的学者也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文物迁移的研究上，包括迁移的路径、负责人物、交通工具、运输路途、安全保管、护送押运等。出现这种情况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因为文物的南迁、西迁都是在华东、西南地区，而当时押运的故宫负责人多为文人，看守文物闲暇时多写日记，留下的资料较多，档案、日记、回忆录等资料均很充足详实，因此研究者也较众。日伪在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的档案资



料，有关故宫北平本院的档案资料分布相对分散，查找困难，另外其他如日本新民会的档案等，由于地域条件的客观限制，难以充分利用，所以目前学界对沦陷期间故宫本院的研究较少；其二，由于北平沦陷过早，故宫北平本院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交通、通信几乎断绝，难以得到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具体行政指导，所以国民政府关于沦陷时期故宫北平本院的档案资料也很少。而故宫留守人员及其子女留下的关于这段艰难时期的日记、回忆录等相关资料也不多，这使得相关研究更加捉襟见肘。

目前对于沦陷期间故宫博物院院史的研究，上述情况直接体现在学术成果上，例如那志良的《故宫四十年》^①谈述了故宫自建院以来40年的发展史，大部篇幅谈述了作者在文物南迁、西迁过程中的亲身经历，虽然也提及沦陷期间的北平本院，但因作者一直在外忙于西迁文物，所以对北平本院情况多是语焉不详。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研究故宫院史的著作陆续出现，例如1987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撰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②一书，收录了抗战时期在北平生活的各行各业人士的回忆录或者口述资料，其中就有单士元先生对于沦陷期间故宫工作生活的回忆。单士元作为留守故宫的代表人物，其留下的资料弥足珍贵，但文字稀少简短，目前亦可见于单嘉筠编《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单士元》^③。而刘北汜的《故宫沧桑》^④介绍了紫禁城的沧桑故事，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及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八年沦陷时期、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接管时期、北平解放后至院庆六十年时期的历史，但作者对于沦陷期间的叙述比较简单，着重提及了留守人员的艰难和捍卫国宝的信心勇气。此外《马衡日记》^⑤、吴瀛的《故宫尘梦录》^⑥、珍妮特和沈大伟的《中国皇家收藏传奇》^⑦等对于北平本院都有提及，但均不够具体。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姜舜源等学者的论文中^⑧，才逐渐专门研究沦陷期间北平本院的相关状况，但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寥寥。

总之，在民国时期故宫院史的研究中，对于沦陷期间故宫北平本院的研究轮廓尚不清晰，研究深度还不够，关注度还不足，在院务、运营、安全保障等方面仍有许多空白亟待填充，许多疑问亟待解释。因此，为理清这个艰难时期中北平故宫本院的大致发展脉络，笔者欲化繁为简，以一个人、一段时期和一个院落为线索，透过经历全程的总务处长张庭济于沦陷前后在故宫本院的工作生活轨迹来尽可能完整地反映沦陷前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① 那志良：《故宫四十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

③ 单嘉筠：《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单士元》，文物出版社，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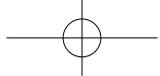
④ 刘北汜：《故宫沧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⑤ 施安昌：《马衡日记手稿》，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⑥ 吴瀛：《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⑦ [美]珍妮特、沈大伟：《中国皇家收藏传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⑧ 例如姜舜源在1989年第1期《紫禁城》中“院所合并”前后一文就谈到了沦陷时期的故宫与古物陈列所的关系，专门谈到了1943年，故宫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授权下，接收合并古物陈列所的事情，最终未果。



一 初入故宫 兢兢业业

张庭济^①，字柱中，号柳西、瘦石山人，浙江平湖新埭人。1895年12月生于平湖新埭，1958年5月病逝于上海。他7岁入家塾“耕书堂”启蒙，13岁入新溪学堂读书，19岁时考入了天津北洋学堂，在22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文本科英文门学习。期间，以辜鸿铭、胡适、杜威等人为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爱国青年的张庭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之一，也是在游行途中被指派去美、英等国驻华使馆递交《说帖》的四学生代表之一。北大毕业后，张庭济曾任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讲师，后来他回到浙江平湖应聘任平湖县教育科长，从事了五年教育工作。直到1934年8月，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先生的引荐，已不惑之年的张庭济始任故宫博物院秘书，从那时起，张庭济便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也开始与故宫紧密联结在一起，哪怕是在被日伪占领、条件最为艰苦的沦陷时期，张庭济也没有离开故宫，反而悉心尽力、艰难维持着当时的北平故宫本院。

1934年12月21日，奉行政院指令，张庭济调任故宫博物院代理总务处处长。彼时中国营造学社正在故宫进行建筑测绘。而代理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和便利。此次对于北平故宫的测绘，发起单位是中央研究院。“1934年该院从庚款基金会里拨款5千元给由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要求学社将故宫全部建筑都测绘出来，出一本专著。这项工作由梁思成负责，邵力功协助，故宫提供方便。自1934年开始至1937年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东西南北角楼等60余处。可惜因战争爆发，故宫的测绘没有完成，已测绘的图稿也没有全部整理绘制出来，最终也下落不明，可能毁于1939年天津水患”^②。这是营造学社对故宫的第一次测绘，半途夭折；后来沦陷时期中国营造学社历尽险阻，经多方努力对故宫进行了第二次测绘，才使得这项工作最终得以完成。

1935年3月，张庭济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6月，他参与商讨了故宫博物院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相关事宜。一个月后，故宫博物院设立文物点收委员会，继续点验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上海后留在北平的文物。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物建账核查工作，对于故宫的文物安全和统计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庭济要求总务处同仁务必密切配合并在工作中谨慎细心。同时，在清查点验故宫文物期间，院方为力求公开透明，函请北平市政府、地方法院、市高等法院、市公安局等机关参与监盘。整个清查留平文物工作至1937年7月，因北平沦陷而中止。同年9月，张庭济筹备并参加了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周年大会和相关的纪念活动。

1935年12月11日，黄宾虹受南京地方法院之聘，对故宫本院留存书画进行鉴定。1936年5月，

① 张庭济，其名字亦有不同写法，如单士元写作“张廷济”，本文依据张庭济的女儿张我元编的《张庭济生平年表》，以“张庭济”为准。张我元、张稼成系张庭济的小女儿、女婿。此年表未公开出版，但是张我元等印刷数本捐赠给张庭济母校平湖小学。本文所用《张庭济生平年表》相关资料即由浙江平湖新埭小学图书室提供。

② 林洙：《中国营造学社史略》页73，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



接马衡院长令，张庭济为即将到北平的黄宾虹先生安排住处和相关鉴定事宜。黄氏在北平鉴定书画，平均每天近四十件，这些书画的传递工作则由总务处安排。而总务处长张庭济对于书画运输途中的安全问题作了很多细致的安排。到8月时，黄便结束了在北平的鉴定工作，得益于细致的安排，整个书画鉴定工作圆满完成，而鉴定的结果也使得故宫本院对遴选出来的精品和真品书画进行了更为妥当的安置和保护。

在1936年4到9月间，张庭济曾参与了筹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保存库的工作，他以严谨的工作态度认真审核验收了文物保存库，并对保存库防潮、防虫、防火、防盗等各项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了严格检验，以为南迁故宫精品文物的安全构建坚实的保障。1933年开始故宫南迁存放在上海的文物有19816箱及85包、扎，在上海共保存了四年，1935年时还挑选出80箱精华之物，前往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6年8月，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当年12月投入使用，存于上海的文物被分作五批运抵南京新库房储存，共有13420箱又64包，历时两年半点收，与南迁文物箱数完全符合^①。但仅仅半年时间之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南京情势日趋紧急。刚刚转迁到南京库房的文物，又根据行政院命令，再次避敌西迁，向后方疏散。

二 沦陷时期“奉命维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北平很快沦陷。所幸，北平故宫中大部分精品文物已然迁徙，留存故宫的文物在战争中也是安然无恙，并未被流弹所破坏^②。当时，马衡院长及院内一些主要人员大部分离开北平，或南下，或转往他处，主要精力都放在保护西迁的文物精品上。张庭济受马衡院长委托奉命留守，负典守之职。1937年11月，沦陷初期，张庭济曾代表北平留守职工折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故宫现状，寻求保护。是月，行政院的训令寄到故宫，内称“折呈悉。经提出，本院第335次决议：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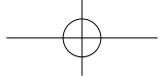
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记录》^④中也有提及故宫情况：会议提交讨论事项“本院总务处长张庭济留守北平，处境艰危，宜取如何态度？讨论决议：飭令该处长继续留守，尽力维持”。马衡院长在向理事会报告院务时指出：“北平本院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华北告陷时起即密飭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终因该处长忍辱负重，赖以无恙，幸免散失。”

① 《中外新闻——要人与要政：故宫文物由沪运京保存》，1937年第34卷第25期，页26。

② 《国际言论：北平故宫艺术珍品平安无恙》，选自《国际议论》，1937年第4期，页108。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档案，选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④ 此件会议记录是2011年张庭济女儿张我元在编《张庭济生平年表》时，由上海图书馆友情提供。



彼时，张庭济只好以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的身份担当着院长的责任。他与留守职工一起，遵循原有体制进行工作，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诚如美国汉学家珍妮特·沈大伟所言：“日军在1937年9月占领北平的时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带了部分珍宝西迁……以后马衡不在的日子里，负责故宫工作的是总务处处长张庭济。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¹在这沦陷的八年中，“留守人员虽然不像随文物南迁的人员那样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也非常难得，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不辱使命。由于大量文物珍品外迁，加上日伪的干扰、破坏，只能勉强维持分路开放，但游人寥寥，门庭冷落”²。

（一）艰难风波

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在外有侵略者窥伺、内有伪政权觊觎的境况下，为保护古物不受损害，故宫博物院历经风波。

1. 日伪宪警抢夺书籍杂志

1938年6月，敌伪宪警两次闯到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太庙图书馆是故宫图书馆分馆。因阅览人数对于门禁出入时感不便，故宫博物院于1935年春间呈请行政院备案，并由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会议议决通过，将故宫所藏重复书籍及历年所收各处所寄赠新书及杂志运送至太庙，设立图书馆分馆，以供众览，于当年6月10日开馆设立³。敌伪宪警两次共劫走太庙图书216种，计314册，其中图书类有《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官书目录》、《上海市立图书馆概况》、《北平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中国丧地史》、《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驳议》、《救亡先鞭》、《共产主义大纲初草》等；杂志305种，计655册，其中有《青年之路》、《中日问题之研究》、《日本侵略中国年表》、《征倭论》等。撕毁书籍26种，计26册，诸如《中西友好通商条约》、《国难记》、《满洲国际问题》、《满洲人民之受害胁迫与太平洋殖民地》、《马克思⁴价值论的批判》、《苏联的现势》等；杂志64种，计4131册，另焚毁杂志5896册，这些焚毁的杂志主要有《中央国难周刊》、《司法行政公报》、《辽宁教育公报》、《统计月报》等。因此，故宫图书馆共计损失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⁵。而面对日伪宪兵的野蛮行径，故宫博物院也无可奈何，总务处长张庭济在指示太庙图书馆做好损失统计、藏匿好部分余下的“敏感”书籍杂志的同时，积极利用人脉关系与日伪政权华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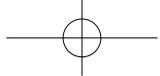
〈1〉 前揭《中国皇家收藏传奇》页129。

〈2〉 俞建伟、沈松平：《马衡传》页109，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3〉 选自《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中《图书馆界：故宫图书分馆开幕》，1935年第10卷第六期，页19。

〈4〉 马克思即马克思，民国时期译法与今不同。

〈5〉 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本院图书馆太庙分馆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清册》，编号：jfqggwwbgl00903。



政务委员会交涉，追讨部分书籍，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在当年8月15日退回来书籍15册、杂志210册，重归故宫太庙图书馆。

总之，在日伪宪兵破坏故宫图书馆的图书、杂志事件中，太庙图书馆损失惨重。日伪宪兵毁坏搬走的杂志、书籍就性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含有反日、抗日、爱国内容，或与日本的殖民地、满洲、日伪政权有关的书籍、杂志一律被搬走销毁，像《抗日救国须知》、《日本在满洲权力及地位》等书更是被直接焚毁。而大量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图书、杂志也是在劫难逃。

第二，凡书籍、杂志中含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等内容的杂志绝对销毁。日本对共产党的积极抗日痛恨至极，也憎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秘密支持。同时苏联也是日本放开手脚推行亚洲政策的阻碍，更是其轴心盟友德国、意大利的羁绊。因此凡与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挂钩的书籍、杂志也一律查禁。

第三，日本在日占区推行愚民政策，在推行日式奴化教育的同时，不允许治下民众接触新教育、新思想、新材料。在严格控制书籍，审查报纸杂志的同时，大量销毁占领区内的由非占领区或者国外发行的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方面的书籍、报刊杂志等印刷物。因此，故宫图书馆有数万册书籍、杂志被毁亦不足为怪，可惜的是，全国各个博物馆、图书馆馆刊及其他刊物都被焚毁，甚至有些孤本刊物亦难逃厄运。

是年秋，张庭济致书给友人，吐露沦陷这一年来苦守维持的艰辛。此时，马衡院长正在随文物西运到四川的路上，当得知此事后，作诗慰藉。诗曰^①：

柳西致友人书述其近状诗以慰之

门户支持已一秋，贤劳多为我分忧。覆巢犹幸能完卵，守阙于今赖运筹。
菱镜尘封余旧梦，萱堂春在慰离愁。知君家国无穷感，华发星星早上头。

由马衡院长的诗可见，他对于张庭济的处境非常同情，又充满感激之情，毕竟总务处长在为他“分忧”，守卫处于日伪阴霾下的北平故宫本院。

2. 日伪政权强制故宫献铜献铁

在经历了劫毁书籍、杂志风波以后，日伪虽觊觎故宫，但仍没有机会下手，直到抗战后期，所谓的献铜献铁运动再次使将故宫陷入了危境。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尤其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迅猛攻势下，日军的人员和战略物资开始紧缺，所以在占领区内多次征讨军用物资。1944年8月，伪政权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通令各机关单位收集铜器、铁器事宜，并成立了专门的机

① 《张庭济生平年表》。



构——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献纳委员会的汉奸们开始发起了献铜、献铁运动，向各家各户、所有单位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以为日军造炮弹壳和子弹用¹。

“这个运动波及到千家万户，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有幸免²”。当时故宫的主持者虽然是日伪政权派来的祝书元，但他并未积极响应这个运动，反而多次与征集委员会交涉，强调故宫的铜器都是古物，且均已编号登册，院方负有典守责任，不能擅自处置国家财产。在故宫中即使碎了的铁环铜器也是历史文物和见证，断不能交出。

然而，由于“早闻日方注意宫内铜缸及历史博物馆铜炮等件，且铜缸陈列于各路线为数甚多，日方也曾借游览之名来宫中调查铜器者不乏其人”³，所以故宫难逃此劫，尽管多次抵制，但最终迫于压力，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一千零九十五斤交了出去。然而金品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因为仅北京一市日本军部下的铜铁征集任务就高达四十万公斤，不逼迫故宫任务难以完成。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故宫不得不找出对策，以免日军冲进故宫任意提取造成更大的损失。经调查，故宫所有院落包括陈列室前后铜制品中除了铜缸、铜炮外，铜鼎、铜兽等珍品亦多。在“院长”祝书元的支持和总务处长张庭济的带领下，故宫职员一道努力，打算将故宫辖区内的两百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⁴。最终，二百多口缸分成三类：（一）明清两代所造有款识者98件；（二）虽无款识，但察铜色类似明代造者125件；（三）无款识，查其式样不能断明年代者54件。最终由彦局长（论陷时期在北平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长的彦应兴）和祝院长会同呈复，并缮具清册，交由委员会审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令将不能断明年代者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⁵。而日人仍不满足，1944年6月22日，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一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此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专门人员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⁶。

后来金品献纳委员会再次索取故宫太庙内的大鼎、铜缸、铜香炉等供器，遭到故宫的严词拒绝，因为太庙的皇家器物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绝不可以破坏、亵渎。

〈1〉 《市政公报：北京特别市政府训令（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令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为训令事查本月六日第三次献铜运动会议决议案》1944年第217—219期，页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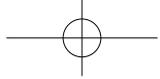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2〉 单士元：《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页172，北京出版社，1987年。

〈3〉 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故宫博物院对于平市历次收集铜铁应付情形始末记》，编号：jfqggwwbg100827。

〈4〉 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故宫博物院对于平市历次收集铜铁应付情形始末记》，编号：jfqggwwbg100827。

〈5〉 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故宫博物院对于平市历次收集铜铁应付情形始末记》，编号：jfqggwwbg100827。

〈6〉 孙岩：《人非物是——八年沦陷的故宫博物院》，《紫禁城》2005年第5期。



除了故宫外，当时的历史博物馆也未能幸免。1945年2月，献纳委员会饬令故宫查明历史博物馆所存铁炮情况：元明两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14尊；明清所造无款识的大小铁炮1406尊。献纳委员会要求，除有历史价值的14尊保留，明清无款识的每类保留一个样品作陈列外，余下所有铁炮都要上交⁴³。3月3日和16日，金品献纳委员会按约带领日军北支派遣军180部队分两次将历史博物馆的铁炮运走。对于当时尚不属于故宫管辖范围的历史博物馆而言，张庭济等人亦无能为力。

在日伪政权强制故宫献铜献铁的过程中，故宫留守职员随时随事应付，总务处长张庭济更是多次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求情求助，才终“以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牺牲次品保全上珍为主旨，最终保存下历代的铜缸铁炮精品，炉鼎像设历代之珍也巍然无恙。”⁴²可以说当事者苦心维护，然为环境所迫，未能保护得完整无缺，对于故宫文物的损失虽无愧却有憾。

3. 日伪政权觊觎故宫院长之位

在北平沦陷之后，按照日伪的规定，北平的各大机关、单位，都要派日本人充当“顾问”，但是故宫博物院却没来一个日本人，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名流的暗中保护和留守人员的尽力抵制，如朱启钤、叶恭绰、陈垣等都在暗中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人更注重军事占领，他们以武力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后，错误地认为中国早晚属他们所有，狂妄地把中国看做其“外府”，把故宫文物也视为他们在“外府”收藏的文物。日人没有想到会有战败投降的一天，所以没有急于插手故宫⁴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本人出于维系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家庭的良好政治关系需要。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毕竟作为前清朝皇室的遗产，且古物陈列所中很多职员是清朝贵族的遗老遗少，因此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可能被日本人认为是溥仪的“皇家私人财产”，尽管溥仪是满洲的傀儡皇帝，无甚实权但是其政治象征意义和号召力仍在。日本人图谋的是，保全前清皇室财产以笼络人心，待日军占领整个中国后，还有待依赖溥仪作为傀儡，来替日本人继续统治中国。出于此政治考虑，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在沦陷期遭受的刁难和袭扰相对较少。

然而日伪垂涎故宫已久，故想任命一名亲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但遭到了故宫博物院的积极抵制。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民国三十二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会议提交讨论事项中有故宫院长争端一项，会议中马衡院长说：“张庭济与留守工作人员，处境极为艰困。北平的伪组织中对故宫博物院院长一席垂涎者众多，王克敏曾想自任院长，由张庭济代行职责，张庭济固拒……地方维持会时期：张处长为求保全故宫文物，不得不相机应付，勉为接受；后关东军派人到院索阅故宫藏地图，张庭济根据院章典力争，经几度交涉，敌伪渐知本院章制严密，故数年来古物未蒙损害……”⁴⁴

⁴¹ 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本院历次被敌军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编号：jfqggwwbgl00910。

⁴² 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故宫博物院对于平市历次收集铜铁应付情形始末记》，编号：jfqggwwbgl00827。

⁴³ 单士元：《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前揭《日伪统治下的北平》页172。

⁴⁴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记录》，上海图书馆藏，1943年。



院长之事拖了很久，直到1942年6月才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任命祝书元为代理院长并函达故宫。具体可见《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关于祝书元就任北京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一事的训令》¹：

余准故宫博物院函开：

兹奉华北政务委员会六月三十日秘人字四二零四号训令：派祝书元暂行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等。因印于七月一日到院就职。祝事除呈报外，相应函达查照。

准此处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

此令。

令警法科

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任命祝书元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的同时，也开始强迫张庭济处长与其合作。张庭济鉴于既成事实，无可反抗，为恪遵密令，尽力维持，保全库藏文物及故宫建筑，提出必须做到：“章制不变；组织不变，旧员不裁，并声明本人不接受新委任，才同意留任总务处长。”²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庭济所取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也能体察到当时留守北平的工作人员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为了故宫博物院，不畏强权，矢志不移。

1942年初，祝书元便和秘书齐之彪接管了故宫。既然伪组织接管故宫主持院务，日本人也就未能再插手故宫。祝书元曾是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铃先生的老部下，从清末起从事北京市政建筑的管理工作，而故宫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也自然是他热衷的工作。而祝书元的秘书齐之彪，字景班，是一位曾与叶恭绰同在北洋政府管理部门工作过的老先生，是著名戏曲家齐燕铭的先人。其实，沦陷时期，伪政权对于故宫的接管，虽然在政治意义上不佳，但对于保护故宫的文物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祝、齐二人与实际主持院务的张庭济一样，均是名望较高的学者，而且他俩还和暗中保护故宫的社会名流关系匪浅³。如果说不是由这些人主持接管故宫，而是由别有用心之流接管抑或是日本人直接插手，对于故宫的文物安全和保存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在祝书元主持院务期间，仍由张庭济负责具体的院务，在业务机构上也未作较大调整，故宫的整体事业也在磕磕绊绊中得以有序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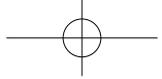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觊觎故宫院长之位的不但有外寇更有内贼。在北平沦陷后，故宫留守人员在张庭济的领导下，绝大多数人仍保持着民族气节，不向侵略者屈服。但也仍有人甘愿做汉奸⁴。故宫里的职员张某就心怀不轨异常踊跃，他与溥仪父亲原摄政王府的大管家相勾结，企图依靠日本人的势

¹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关于祝书元就任北京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一事的训令》，档案编号：J181-022-14020。

² 《张庭济生平年表》。

³ 前揭《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单士元》页83。

⁴ 前揭《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单士元》页83。



力接管故宫，圆自己做故宫院长的美梦。由于溥仪在伪满洲国，其家人、仆人、均到东北依附，唯有大管家留在北平，助日本人进行文化侵略。张某要利用日本人势力做故宫院长，大管家则想通过张某，帮助日本人将势力渗入到组织严密的故宫，两人一拍即合，互相利用。甚至张某还提出在他任院长后，让大管家做故宫各部门的总负责人。张庭济见情势不妙，便找到在华北伪政权任职的熟人汪时璟，请他帮忙暂缓阻碍此事，待上级任命。不久，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便安排祝书元来代理院长了。在沦陷期间，张某上蹿下跳，活跃于日伪间，肆虐于宫墙内，贿赂收买留守职员为己所用，对不愿依附者则打压排挤。当时在文献馆供职很久的单士元就是受害者之一，张某在拉拢收买单士元不成后，便痛恨至极，怒火中烧，最终请日本人出面找他谈话，软硬兼施，最终因未查到他的反日行为而作罢。总务处长张庭济也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同样受排挤刁难。代理故宫院长的祝书元得知单士元在文献馆的危难情况后，鉴于其与朱启铃、叶恭綽二老关系甚好，便将他从文献馆调到了图书馆工作。不过日本人汉奸仍不甘心，最终威胁恐吓，逼迫单士元贱价卖掉祖宅才罢休。日伪汉奸的猖獗可见一斑。

（二）院务继续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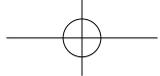
在沦陷期间，“故宫北平本院虽遭受种种压迫与困难，院务并未停顿，各处馆工作，仍于可能范围内继续推进”^①，在这八年中，经故宫留守人员与其他单位人员努力合作，仍取得一些成果。

1. 故宫测绘

北平沦陷以后，梁思成到昆明避难，北平中国营造学社解散。作为负责故宫日常工作的张庭济，为完成故宫测绘工作，曾多次向北平建设总署提出要继续完成故宫测绘工作的请求。中国营造学社创建者朱启铃面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大量古代建筑遗物，也极力主张必须及时对其实物精确测绘以防战争损毁，力主对北平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再次进行精确的测绘。1940年，经人介绍，天津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张铸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朱启铃。朱启铃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难逃500年一次大劫之灾。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他十分珍惜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认为这是传统建筑的瑰宝，要及时精确实测以留下真迹”^②，同时朱还提议以华北基泰工程司的名义与之签订承揽测绘故宫中轴线古建筑合同。张铸甚是赞同，并提出愿意亲自带队测量以故宫为中心的古建筑。经过多方努力得到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批准后，又由伪建设总署出面协调各方。1941年时伪建设总署致函故宫，“选启者，查本总署为测绘故宫等处建筑物，业已与建筑师张叔农订约，委托办理。自七月一日起开始工作。惟此项事业有时须支塔、架

① 北京市档案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档案编号：J001-003-00257。

② 《建筑创作》杂志社：《张铸：我的建筑创作道路》页123，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木，特此函达……昼照特行……更利为何。”⁴¹主要是让故宫为测绘事宜提供便利，当时负责故宫事物的总务处长张庭济下令故宫内留守人员积极配合测绘人员，为他们提供所有力所能及的帮助⁴²。

从1941年起至1944年末，伪建设总署和北平市计划局委托华北基泰工程司，由张镛主持对北平中轴线及其外围重要古建筑进行系统的测绘。在张镛的带领下先后测绘了故宫中轴线以及外围的太庙、天坛、先农坛、社稷坛、钟楼、鼓楼等古建筑，范围主要集中在中轴线上，北起钟鼓楼，南抵永定门，重点是紫禁城内的建筑。由于此次测绘工作是从古建为战争毁坏后重建的初衷出发，所以前期规划甚是详细，计划大约历时四年共分三期完成测绘。测绘的内容比较精密丰富，手段也比较先进，为了保存真迹，图纸是用厚的橡皮纸，每张尺寸为42英寸×60英寸(相当于1.07米×1.53米)，在比例尺上至少为1:100，某些细部为1:50或1:20。“这套图纸除单体建筑有精密的平面、立面、剖面和大样图外，各宫院还有总平面图、总立面图、总剖面图，更为重要的是，还都是按当时设计图纸的要求，直接在外包装上标出外包、轴线、局部三套尺寸。每座单体都对屋面及内外梁架的彩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测绘。除彩画外，其他细部纹样在测绘图中都有十分精细的描绘，如室内外铺地、阶条石、槛墙砖缝、门窗纹样、吻兽纹样等，有的大样图甚至画出滴水、勾头的图案”⁴³。

该次测绘的工作人员除少数自培的绘图员外，主力是张镛带领的天津工程学院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的10名学生，直到测绘末段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师生才加入。另外还有基泰事务所同仁20人以及林镜新摄影师、许致文统计文书兼会计、传统技艺的老架子工扎匠徐荣文父子等。为了在战乱中保留中国古代建筑资料，所有人的工作都十分认真，把每一构建都加以详测，即使雷同也不放过，甚至连玉台台阶、栏杆也是步步实测⁴⁴。在测绘时还有专门的摄影师跟踪拍摄影像资料，为以后存档参考和图纸对比用。这样，直到1944年秋，以故宫为主的中轴线测绘工作历时4年才得以完成，最终绘制出了大幅图纸680多张，另附大量的古建筑照片及测量数据记录手稿，这些都为建国后故宫古建的修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甚至有人认为，这次对北京中轴线建筑的测绘可被誉为二战期间建筑界保护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一次壮举⁴⁵。而当时参与测绘的的学生、现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的冯建速也称：“这次实测是故宫自明朝建成后50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程测绘，这件事也是中国古建史上的一次壮举”。⁴⁶

〈1〉 北京市档案馆：《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测绘故宫建筑的公函》，档案号：J001-004-000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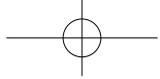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2〉 故宫博物院档案：《函达测绘故宫等处建筑物日期及办法希查照随时予以便利由》，编号：jfqgwzzswl00242。

〈3〉 傅熹年：《一次记录和保存明清紫禁城宫殿资料的活动》，转引自马国馨主编：《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4〉 张镛写给家乡政协的回忆录，未正式出版。转引自金磊：《北京中轴线建筑遗产保护与传承》，《北京规划建设》2012年第2期。

〈5〉 金磊：《北京中轴线建筑遗产保护与传承》，《北京规划建设》2012年第2期。

〈6〉 《回望中的欣喜与慰藉——冯建速先生忆20世纪40年代北京故宫中轴线的实测》，《建筑创作》2002年第8期。



2. 文物点查与保管

北平故宫博物院自1934年改组后，易培基被诬下台，马衡接任，因院长更迭办理交接的需要而成立了文物点收委员会。期间清点各宫殿文物的活动详见历年工作报告。至1937年7月，已点迄十之八九，后因北平沦陷而中止。1942年12月，在总务处长张庭济的领导和部分学者的支持下，中断5年之久的故宫文物点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到1943年3月全部点收完毕。计补点图书、文献两馆及前漏点各处文物，共计11483号，凡202080件。1943年以后，复发现漏点物品，所以由主管科以逾字号补点，计60号171件。总计历年所点之总数，为93729号共1189058件^①。本院各宫殿庭院的陈设品，以前未经点收，总务处第二科自1943年6月始编号登记，至1944年2月完竣，计共编修字775号。

虽然沦陷后面临种种压迫与破坏，但是故宫的文物保管工作不仅做得一丝不苟，而且比以往更加谨慎。对于故宫内各宫殿所藏的物品，属于文献馆、图书馆者各自严格保管。不属于各馆而属于总务处第二科保管者，数量很大，为了保护这批文物安全，在故宫东西路内各开辟了一处库房，将不属于各馆的物品整理存放。其中外东路选定了寻沿书屋为库房，安放了四执库等处的皮货；内西路选定了重华宫厨房做库房，安放了木器和杂件。对于坍塌漏雨宫殿里的东西也整理挪移到安全库房，避免损伤。

当时对于院内文物安全要求严格，要求职工定期检查各宫殿封锁情况，遇到破裂损毁，立即照章查补，而且对于所用的封条数目领取人员、单位等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记载，以备查验。自1937年7月到1945年9月共用了345037个锁封，而故宫共有9900多间房，可见巡视的频度之密、工作之细。

另外对于物品的提取有严格的规定，故宫各管科提取物品，均需按照规定程序，先经各馆科开送通知单请提后，由总务处主管科会同各馆科人员进组提出，点交经手人员收讫，填付收据，分别记载于提取物品登记簿，以确保万无一失。而对于出入故宫物品放行检查更是严格，故宫里的文物，无论何人都不准携带出院，例如器具、文玩、纸张、出版物等均需接受严格审查。即便因工作需要，暂时将故宫物品带出，也要总务处第二科开放行单才可。

3. 工程维修

七七事变后，故宫博物院经费支绌，门票收入微薄，而财政拨款中断，各项预定的较大工程无法进行，只好对坍塌毁坏严重处进行小规模修缮。从1937到1945年，故宫利用自身资金和伪组织的拨款共修缮了包括故宫本院、太庙、景山、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御史衙门、皇史宬、簾子库、大高殿等在内的53处工程，其中利用伪组织文整费项下的拨款工程就有16处，但多为耗费较大项目，而故宫出资维修的仅有37项，因经费困难，维修的多是小项目。虽然修缮较少，但在当时恶劣环境下已实属不易。

4. 陈列展览

北平沦陷后，故宫从安全角度考虑，关闭了一个多月。然而失去了经费来源后，故宫事业举步维艰，无奈只好重新开放。而为更好地守护故宫博物院，故宫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着陈列展览

^① 北京市档案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档案编号：J001-003-00257。



的线路和计划，并在总务处长张庭济的统筹安排下，定期更换展品并举办多个专题展览。如为增加观众参观的兴趣古物馆各陈列室不断改善策划，分类选择提取物品，审定精品以分别陈列，将承乾宫清代瓷器移于景阳宫，而另开御书房为宋元明瓷器陈列室(后该二处被统称为历代名瓷陈列室)。而相应地，对其他铜器、玉器等器物的展览安排也作了调整，极大改善了参观条件。

1937年9月，为安全管理计，故宫陈列室被分为两路。中路和内东路每日开放。1938年3月，分为三路开放：每周一、四开放东路；周日及周二、周五开放中路及内东路；周三、周六开放内外西路。每月逢单日开放内东路及外东路，逢双日开放中路及西路。初期，参观门票每券收费5角，1942年1月门票涨为1元，1944年4月改为2元，1945年1月改为4元，6月时改为10元。另有优惠政策：凡军政机关或学术团体同时有10人以上来故宫参观，票价减半；学校学生10人来参观者，每人收票价五分之一，即收2元；五十人以上者，每百人收票价之十倍。由于故宫本院展览线路众多，故宫藏文物吸引力较大，所以在沦陷时期，来故宫本院参观的人数众多，在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间共有1966093人次进故宫参观，其中购券者1860769人，免费者105324人^①。

5. 编印出版

在沦陷期间，虽然故宫博物院历经风波，遭遇重重困难，但是文物编印出版事业也在困难中继续推进。这一时期，故宫的编辑出版还没有设置统一的机构进行管理，总务处只是统领协调，具体工作是由各馆独立进行。沦陷期间各馆编辑出版情况具体如下：

(1) 古物馆

自1933年古物南迁后，古物馆担任编辑校对工作，其摄影印刷工作先后由驻沪办事处和南京分院承担。抗战时期，南北隔绝，材料既乏，经费拮据，故八年来，仅有留平的残余书画中出版数种，其余均是重版刊物，为数亦远逊于前：八年中，古物馆主要编辑了《故宫月刊索引》、《古书画小传及收传印记考》等共29条项；编校重版《故宫月刊》第三期至第五期说明等14项；续编《古物馆概览》等2项；改编二十五年度本院出版物总目等2项；编录清代两浙名人小传著录表2项；校录僧法常巷说明稿件3本；抄录思庵题跋稿件等8本。出版方面：初版《影印唐虞世南临兰亭贴》等碑帖17种影印本；再版《影印唐孙过庭书谱》类书法绘画等28种；制作青铜器、瓷器等的拓片和照片11种，多张^②。

(2) 图书馆

自七七事变以后，因经费拮据，图书馆所编各种刊物，多不能印刷，编辑了《故宫方志续编》、《故宫所藏四库著录书目》、《陶然亭诗》、《馆藏年谱简目》等16种。

(3) 文献馆

沦陷期间文献馆编印工作也因经费关系，多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仅有少数出版编辑的有

① 北京市档案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档案编号：J001-003-00257。

② 北京市档案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档案编号：J001-003-00257。



《档案辞解》、《筹办夷务始末索引》、《清代典章辞制》、《军机处来文主题索引》、《校补满文无圈点字书》、《文献馆所藏档案分类表》、《文献丛编》、《文献专刊等》等8类；出版的主要有《文献丛编》、《苏州织造李煦奏折》、《清内府藏京城全图》等8种出版物。

(4)另外不属于三馆，主要由总务处编印出版的有：《清宫述闻》六卷三册，《清宫述闻续编》六卷，《宫殿摄影》和《故宫导游》、《本院工作报告》六册，另外故宫大量照片摄制的工作，仍继续进行。

综上所述，北平沦陷的几年内，故宫在风雨飘摇中，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1947年9月3日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讲演时说：“在北平沦陷以后，我们留守的全部人员，处境极为艰困。当时虽没有‘地下工作’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奉命维持。在这八年之中，前五年完全由留守人员苦心孤诣地妥为应付。后三年，虽伪政府派有主持的人，实际上仍由留守人员保管。”⁴¹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总务处长张庭济的带领下和故宫留守职员共同努力下，故宫的院务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取得一定成果，这些成就都为故宫和日后的有序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 光复后仍发挥余力

1945年10月10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地区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典礼在太和殿前广场举行。不久张庭济接马衡院长指令，于23日会同国民政府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办理北平本院各部门接收工作²。“接收工作进展相当顺利，院里职员，十之八九为抗战前的旧人，全部留任，只有伪院长及少数敌伪派驻的高级职员免职。机构设置仍如旧制，设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及总务处。马衡院长，各馆馆长，总务处处长都恢复了原来的职务”³。“沈兼士接收后，当即革除祝书元代理院长职务；日伪聘任之临时理事、监事，同时解职。所谓《整理院务临时办法》，亦予废止。故宫院产发还，由原总务处张庭济处长代表接受”⁴。

当月，接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及马衡院长令，因筹备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的需要，为“清损会”安排办公地点，张庭济将北海团城上的两间房借给平津区办公处使用，并借调贾玉田暂时协助办公处工作。12月29日张庭济又与王世襄、张重威等人商量合作，经宋子文批准后，最终政府决定全部收购郭葆昌瓷器，并请张处长指定日期去郭家清点接收。

不久，王世襄经古玩商提供情况得知，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珍贵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侨商禅

〈1〉 马衡：《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紫禁城》2009年第3期。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档案，选自前揭《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3〉 前揭《故宫沧桑》页130。

〈4〉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辑：《故宫跨世纪大事录要》页307，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2000年。



臣洋行经理杨宁史买去，藏于东交民巷瑞典百利公司¹¹。1946年1月，故宫总务处长张庭济会同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北平警察局、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天津办公处，以及行政院长临时驻北平办公处等人和单位，开始了对杨宁史所藏青铜器的调查处理。经宋子文的“点拨”及各方出面干涉，杨宁史同意将这批青铜器交给故宫博物院保管，并定于1月22日在故宫交接。之后，用了约一周时间，张庭济完成了交接总体安排，起草了有关交接文件，确定了参加鉴定人员及完成了展示室的布置等具体事务。“22日一早沈兼士、于思泊、邓以蛰就来到故宫，得知张庭济因昨夜高烧不退，卧床不起，不能一同前往，专门指派秘书赵儒珍前往¹²”。最终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思泊、邓以蛰及两名德国文物专家等在故宫御花园绦雪轩点收，经清点有古铜器121件、古兵器120件，全部由故宫博物院保管并辟专室陈列。

1945年底，为向北平市政府报告沦陷期北平故宫博物院八年发展状况，总务处长张庭济主持编撰出版了《国立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概括性地总结了八年沦陷期间的故宫北平本院的艰难发展情形，为后世研究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留下了重要资料。

四 无奈时局离开故宫

关于故宫的领导机构，自1928年10月起故宫博物院直隶于民国政府，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的隶属关系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自1933年8月起，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1943年起隶属教育部。1946年12月复归行政院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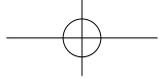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1948年3月，古物陈列所正式并入故宫博物院。张庭济以故宫院方接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与古物所方点交委员会张允亮主任委员负责点交接收。正式接收了古物陈列所留存在北平的文物及房屋馆舍，重新布置了太和、中和、保和、武英、文华等殿，并将其辟为南路参观路线。双方从9月1日开始点收古物所文物，至11月底全部交接完毕。因为1933年后南迁再西迁的故宫文物，回到了南京朝天宫库房，所以张庭济在接收古物所工作的同时，接令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工作，职务还是总务处处长，主持分院工作。

1948年9月以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很快。平津被围，徐蚌紧急，南京岌岌可危，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往台湾。行政院商定选择故宫精品，分批运往台湾。迁运的筹划工作由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杭立武负责。11月10日，张庭济收到马衡院长回复密电：“南京张处长，太密。青电悉。迁台事，如理事会负责决定，当遵办。并添选书画人员，派安顺原班。衡。蒸¹³”。在收到马院长电文后，张庭济接令赴北

¹¹ 《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文化消息：故宫博物院接收工作》，1947年复刊，页62—63。

¹² 天津市档案馆周利成、王勇则：《天津旧闻：瑞士人献宝故宫解放后被驱逐出境》

¹³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档案》，选自前揭《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平，参加马院长在故宫博物院本院召开的“关于如何应对行政院和杭立武电催尽快将文物精品迅速装箱南运指令”的院务会议。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古物馆的朱家溍(代表身在上海的馆长徐鸿宝)，文献馆的单士魁和张德泽(代表已经赴台的馆长姚从吾)，还有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和秘书赵席慈。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以保护文物为重，对将故宫文物迁台的命令采取拖延战术。故宫博物院自12月14日闭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开始运台。由于南迁文物数量大，为此，工作人员又一次对文物进行了精选，并分三批运台。至1949年1月底故宫南迁文物中的精品计2972箱被运往台湾。

这时已经55岁的张庭济，主要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工作。其间，母亲病重，回平湖新埭库港；但分院工作又不能脱身，又到南京，就这样多次奔波在平湖、南京两地之间¹。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1日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管制，随即进行人事调整。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8日宣布实行军事管制，5月7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处接管。张庭济在此前，曾主持南京分院工作；军管会接管后，经全体员工大会决议，张庭济为分院总负责人。接管后，“组织变更情形：该院员工原有57人，而留守者仅27人，员工不敷分配，原有组织机构势必予以精简，人员重新分配。经全体员工大会决议，行政上分库务、总务、经济三组，总负责人为张庭济，所有院务秉承高教处及北平总院指示办理”²。1949年6月，故宫再次进行人事调整，马衡备感纠结，两次“与于坚详谈调整人事及评定薪金事”，“为调整人事，颇费周章”。³后来，“一区第十派出所吴副巡官昌，偕一警员来张家两次……惟询及张处长，告以业经免职……”⁴即在6月时，张庭济被免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之职。对此，他没有任何抱怨，虽然被免职但他仍是故宫的一员，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7月，他在南京参与筹备了故宫分院举办的“纪念八一建军节文物展览”，并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迫于形势，一个月后，张庭济正式向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递交辞呈，告假回乡。

总之，张庭济虽于不惑之年才进入故宫，参与故宫事业比较晚，但是在沦陷期间他却成功地领导留守人员保护了故宫。在沦陷前后，他为故宫博物院事业日夜操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面对时局的无奈，张庭济毅然决定离开，以摆脱其在沦陷时伪政权下领导故宫这一政治上的瓜葛是非，最终选择了“既不去台湾，又不回北平，走一条回归故里之路”，张庭济在北平故宫的16年工作经历，可以说是沦陷前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发展的最好见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项坤鹏)

① 《张庭济生平年表》。

② 南京档案局：解放南京红色档案《接管南京——接管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概况》，该史料是高教处接管委员会1949年11月7日的书面文件，现藏于南京档案局。201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南京档案局于6月20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解放南京红色档案专题”时发表的。

③ 施安昌编：《马衡日记手稿》“1949年6月29日日记”，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④ 前揭《马衡日记手稿》“1949年6月29日日记”。

